

突破二元结构的封闭

当代中国西部发展探微

· 叶 小 文

在研究当代中国西部的发展问题时，我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加强扶贫、强化投入的一面，而对大量投入后产生的各种效应及其原因，缺乏必要的反思，也很少上升到“二元结构的封闭”这种理论高度去认识并寻找对策。本文试图就此作一些探讨。

主张对西部强化投入的理由主要有三种。一是生产要素短缺论，认为西部资金不足、人才缺乏、生产手段落后、市场发育不良等诸种生产要素短缺，使西部自然条件中资源蕴藏丰富等优势难扬其优，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等劣势尤显其劣。局部优势因要素短缺而难以形成有效组合的经济运行系统，总是被系统其他部分的劣势所抵消。因此，必须增加资金、人才、技术等短缺要素的投入，才能补其所短扬其所长。**二是劳动力过剩论**，认为西部的贫困不应简单归结于要素短缺，导致贫困恰恰是因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要素过剩。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W.A.Lewis)的研究证明，在不发达经济内部，当最低生存水平已确定时，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如果劳动力人口增加到某一个临界点，其增加部分的边际生产率虽然大于零，但小于最低生产费用；如果再增至某一个临界点，则要增部分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有无这两部分新增劳动力的投入，总产值都变动甚微，而人均产值却反而因新增劳动力的投入而降低。西部传统的一元农耕经济，就处于这种“穷则大家干、干则大家穷”的状态。为此需要加快投入工业企业，吸收不发达经济内部的过剩劳动力以提高其边际生产率，走出低效益均衡的陷阱。**三是旧体制约束论**，认为制约西部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体制问题，向旧体制的各种要素投入已发生了明显的效益递减。而且，旧体制支撑下的发展运行，是建立在中央每年大幅度递增的财政补贴基础上，今天这种旧有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西部发展面临的抉择，是通过投入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促使新旧体制转换，而政府采取向东部倾斜，大力推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难以向西部投入大量人账物力改善其物质环境，因而应致力于改善西部的政策环境。

这三种论点对问题分析的深度不同，主张投入的因素也不同，但强化投入的要求却是共同的。诚然，以各种投入的因素为先进的一元，原有的不发达经济、社会状态为落后的一元（与通常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略有不同），预期通过先进一元的冲击、扩张、辐射、带动，打破旧有的以局部区域封闭式内循环为特征的自我平衡，通过投入，使西部经济从低效益均衡的一元结构发展为非均衡的二元结构，并在二元结构的格局下重建新的平衡，推进二元结构向着稳定、均衡增长的新的一元结构过渡。但深入到实际中去考察就不难发现，实现这一过程需要极为艰苦的努力。投入带来了发展和希望，也遇到了落后一元的顽强抗衡，表现为一连串的负效应。

首先，生产要素、工业企业的投入，会连带产生贫血效应、孤岛效应和蜕化效应。

贫血效应：发达地区的支援往往很难激发贫困地区的内在活力，甚至“越扶越懒”、“越输血越贫血”。西部的一些贫困县，年年吃补助、要贷款，生产方式依然如故，生活方式却“不甘落后”，甚至滋生出一种靠补助、借贷款来请客吃喝、建屋比阔的奇异的“借贷消费方式”。贵州一些贫困的村寨滥饮成风，人称“家家烧酒、户户醉人、喝死拉倒”，“越是穷得精光，越要吃光喝光”。该省某县是一个缺粮县，每年要调（购）进粮食1500万公斤，1988年定购入库任务仅为600万公斤。但据1987年统计，农民家庭酿酒（多为自饮）1688吨，加上县办乡镇企业酿酒（低档白酒，主要内销）共达3223吨，耗粮522.8万公斤，占调进粮的39.5%，占定购粮的95.4%。喝酒的成年人按全县总人口的一半计算，人均年消费白酒27公斤，“喝”掉粮食47.5公斤。

孤岛效应：西部的工业主体，是靠国家从外部迁入，或为开发资源投资兴建的。国家投于三线建设的资金累计达1800亿元。这些迁入式的“飞地”经济，大都成为相对独立、自我生长和发育的孤岛，与地方的产业关联极差。除了采掘业吸收一些地方劳动力外，三线企业和冶炼、加工业等很难吸收当地素质低的剩余劳动力，以至“墙内机器轰鸣，墙外刀耕火种”。西部现代产业的迁入和建立，是与大量的人口迁入同时进行的。解放后我国省（区）实际人口迁移总数在2500—3000万之间，其中大部分是从人口稠密的地区迁往西部。据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的调查，国家为开发云南省安宁县城的矿产资源，相继投资近40亿元，兴建大中型企业数十家。但在传统经济体制的强力控制下，这些注入型大工业形成了生产参与的技术屏障和体制屏障，使县属经济无法利用经济发展机遇，而国有大工业对区域的进入也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资金贡献、就业贡献与市场贡献。

蜕化效应：现代企业的辐射往往很难带动社区功能的进化，却反过来被特定的社区环境所制约、所封闭，不得不“锅碗盆瓢一起引进”，以各个企业为核心建立一个个离散的福利型生活社区，致使企业经营目标变异，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降低。贵州企业因“企业办社会”而承担的社会负担费用，平均比东部高50%以上。即使建立在西部中心城市的一些企业，也因远远游离于现代工业体系之外而陡增协作、交际成本。如贵州柴油机厂与上海柴油机厂均生产4135型柴油机，单机成本“上柴”5054元、“贵柴”6923元，后者高出36.98%。“贵柴”外配件生产基地主要在华东，每年仅因超储积压外配件以保正常生产之需，就要多增利息100万元。据全省100个重点加工企业调查，同一产品因协作障碍而造成的成本增大，一般比东部企业高约10%。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留利偏低，发展资金匮乏，加上经济信息不灵，技术更新迟缓，经营管理不善，企业难免发生蜕化，“桔逾淮则枳”。国家在西部兴建的一批骨干企业，其中不少竟已近风烛残年，工艺技术落后，厂房设备破旧，经济效益低下。如兰州炼油厂的综合效益在全国同行业中曾名列第一，现已落到最末。

其次，政策的投入，会连带产生扭曲效应、衰减效应和龙尾效应。一是扭曲效应。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政策放宽、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西部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但同时落后地区农民所固有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自发性，也随之高涨，这种背道而驰的“双向积极性”，为农村经济的深入发展埋下了隐患。如贵州继“大跃进”、“文革”后的第三次大规模毁林开荒，恰恰发生在政策放宽、包产到户之后。不是农民不懂得水土保持、退耕还林、以林养地，但“不退地不依，要退人不依”，给人“松绑”的政策恰恰被扭曲为“依人不依地”的对策。二是衰减效应。贫困地区的发展不能放任自流，需要有力的政策调节和干预。西方经济学的所谓“政策效益递减”现象，在

我国西部表现甚为明显。越是贫困落后地区，当地的依赖思想越重、外来的救世主思想越浓；群众对政府能力、政策作用的期望值越高，政府能力、政策作用的实现值越低。政策再好，层层下传，层层衰减，最后到了执行者那里，往往有一半不清楚，清楚的又有一半不会用，会用的还有一半不兑现。三是龙尾效应。远离决策、信息中心，“天高皇帝远”，政策、信息的投入和作用过程都大大拉大。政策甲在其他地区推行已臻尾声，需要替换为政策乙，但在落后地区政策甲的作用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西部的同志常说，全国政策调整往往是西部吃亏，“宏观控制一刀切，人家切在尾巴上，我们切在脖子上”。

种种负效应说明，西部作为一个相对封闭、贫困落后的一元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当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先进因素投入其中时，虽然打破了旧有的一元结构的封闭，形成了先进与落后并存的二元结构，但同时也衍生出先进与落后互斥的结构性封闭机制——二元结构的封闭，落后对先进消化不良，先进对落后水土不服，先进与落后格格不入。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外部投入的大工业的发展相脱离，大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场、社会服务，地方经济难以提供；大工业所带来的投资及产业关联效应的机会，地方经济也难以分享，双方形成了在劳动、技术、资金、市场等生产要素上互不对流、各自循环的结构性封闭机制，致使先进一元的投入成本和后进一元的投入需求都不断增大，而经济效益却不断降低。“一五”期间，国家对内地投资的比例即占全国总投资的47.8%，沿海仅占41.8%，还有10%是不分地区投资。而对三线建设的投资，“一五”期间占全国投资的30.6%，“二五”期间占36.9%，“三五”期间占52.7%，比同期对沿海投资比重高21.8%。^①投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启动了西部的工业化，但东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却越拉越大。据郭凡生等对东西部及全国相关的2000多个数据的综合分析比较，1981—1985年东西部拉大的差距已等于过去30多年的总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差额由2561.6亿元扩大到4359.99亿元。

二元结构的封闭之所以成为西部发展的瓶颈，是因为：第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在相继完成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渐进过程。先进因素的强行投入旨在缩短这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无疑是在历史进步，但必然酿成先进与落后的巨大反差和剧烈抗衡，使投入后产生的负效应抵销了相当一部分正效应；第二，西部并不具有东部经济发展的历史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即东部可以通过耗用大量不可更新资源进行阶段突破的“挥霍性增长”，通过作为近现代中国工业发祥之地而吸引、凝聚全国资源，通过发达的通商口岸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形成内外开放的态势，并以此较快地突破二元结构的封闭，这些东部之所长正是西部之所短；第三，在旧体制约束下，四十年来对西部的投入基本上采取了一套由外部嵌入开发和外部操作运行的模式，以及自上而下的垂直型封闭式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客观上强化了二元结构的封闭。因此，西部的二元结构封闭不仅仅是一种人为的封闭，从而只靠强化投入便可打破；不仅仅是一种政策性封闭，从而只靠政策突破便可改观；也不仅仅是一种阶段性封闭，从而只靠几次冲击便可突变。正如刘易斯通过对世界不发达经济的悉心研究发现，在低效益均衡的陷井中，劳动力的过量投放反而是贫困之源；我们通过对中国西部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发现，在二元结构封闭的陷井中，只靠先进因素的强化投入也未必是致富之路。

既然二元结构的封闭如此难以突破，是否就只能减少或终止投入，倒退到低效益均衡的

^①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学院编：《工业布局参考资料》。

一元结构中去呢？倒退就更不可能有出路。如果东西部差距继续拉大而出现断层，国内市场将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循环，势必危及东部的扩大再生产，甚至危及东部能源、原材料的供应，悬殊的经济差距还可能转化为敏感的宗教、政治、社会问题，危及安定团结。可见，西部发展需要强化投入，但关键却不在投入，而在于千方百计地减少投入后的负效应。**谨慎地分辨、认真地扶持在外部投入的先进因素影响下内部生长出来的、虽然幼小，但代表着西部新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萌芽，努力突破二元结构的封闭，缩短二元结构向新的、稳定发展的一元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乃是西部发展的必由之路。**

突破二元结构的封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上述的六个负效应，根据西部发展的若干经验教训，参照西部问题的若干研究（如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1988年对云南安宁、1988年对新疆的实证研究），谨提出以二元对接为核心的若干思路。

一、发展战略——在二元之间培育多重耦合点

突破封闭，需要在二元之间形成一条有机关联的链，这条链不是由单一的最佳耦合点、而是由活跃的多重耦合点组成。每个点既是新生产力的增长点，又都与前后的相邻点发生产业关联，多重耦合，多头并进，多层启动，若干个局部的量变形成发展共振，引起总体质变，聚集为突破二元结构封闭的强有力态势。**西部发展的战略重点，并非选择最佳突破口，如理论界的或以优先发展小城镇、或“平地建新城”、或以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集团、或优先开发建设能源、原材料基地“最佳战略重点”之争，而在于培育多重耦合点以突破二元结构封闭，重点恰恰在“无重点”之中。**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培育多重耦合点，列出产业关联链。

在关联链中，每一点都要培育自我发展和前后关联的双重功能。例如，农村商品经济小开发单元，即在专业户基础上走向规模经营的小农场、小林场、小种植园、小养殖场等，它一方面还带有小农经济的色彩，易为落后地区的农民所习惯；一方面又是商品经济取代小农经济的初始载体和最小单元，投入少，产出过程简单，资金周转快，易为农民接受；另一方面还是二元对接的低层次耦合点，适量投入，加以扶持，即可发展为规模放大的扶贫经济实体。如贵州安顺的“安酒集团”，就是依托传统产业兴起的工业。安顺地区农民历代有自酿自饮的习惯，但出酒产量小、技术落后、质量低劣。国营安酒厂因势利导，在镇宁县扶持了107户酿酒个体户，深入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及酿酒原料，抓好质量和经营管理，使之成为厂外的初酿“小车间”，然后集中加工，组织外销，现已在国内打开市场，成为全国销量最大的几家酒厂之一。安酒厂通过镇宁个体户每年增产7000吨窖酒，少投资4000万元，五年内还可拿回税利4000万元。镇宁县财政收入年增120万元，增长25%。107户农民的总收入也达100万元左右。富国富厂富县富民，一举四得。

二、发展模式——在多重耦合点中建立三级增长极

发展战略上的培育多重耦合点，不等于发展模式中的一概排斥重点，在聚集了一定的经济能量后就要建立增长极。在发展经济学中，增长极指具有投入产出联系的产业群聚集的、可提供各种服务的、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它既有通过一体化吸引周边要素促进中心发展的极化效应，又有通过经济能量的辐射与示范促进周边发展的扩展效应，因而是西部突破二元结构封闭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从西部发展极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可考虑建立三级增长极。一是以西部的若干中心城市为依托的高层次发展极。应逐步扩大“市带县”范围，适

当搬迁集中三线企业，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核心，加强辅助部门、地方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使迁入企业和地方工业、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在这里有机融合。二是以市县城市、能源矿产开发基地、远离城市的三线企业群体为依托的中层次增长极。应通过完善城市功能、改造福利型生活社区等提高极化程度，放手发展集体、私营企业，培育、壮大地方产业体系以强化扩展效应。三是以县乡集镇为依托的低层次增长点，要在农村物资集散功能的基础上增加科技、文化、信息交流功能，使之真正成为带动广大农村发展的富有生气的生长点。

三、产业政策——发展第三产业，推进二元融合

二元结构封闭仅靠大工业孤军深入难以突破，地方工业的发育成熟又需待以时日。而第三产业存量较小，对小产业存量进行二元融合，比大产业存量来得容易。第三产业包括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为消费服务的部门，是二元结构中最为活跃的关联因素。目前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是因为其存量虽然较小，增量也缺乏来源和对象。如以外向服务为主，则投入成本较高（如发展旅游业需要投资配套基础设施）；如以内向服务为主，则本地需求不足。为此，要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引导本地需求，提高外向服务能力。

四、改革重点——推动社会集资，发展股份企业

突破二元结构封闭有赖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横向流动与重新有效组合，各种社会集资和股份企业的发展，正是其有效杠杆。要积极发展和活跃地方金融组织，建立和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巩固和发展多种类型的地方性非银行信用机构。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行股票、债券，公开拍卖经营不善的国营小企业。实行企业承包、租赁制的中小企业，对承包、租赁期内资产增殖额超过承包、租赁指标基数的部分，可按一定比例转为承包或租赁经营者的个人股份。对中小企业的存量资产，在承包、租赁期满后，可划出一部分作为股份由本企业职工认购。发展股份企业只要政策合理，还会促使部分不利于发展工业的贫困县的资金，合理转入本地区比较效益高的生产项目，避免扶贫资金外溢。

五、市场开拓——挤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西部内陆省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受东部屏障分隔，对外技术引进和对外贸易要依靠东部口岸和远距离运输，产品受到国内、国际市场的双重竞争压力，迫使西部二元结构中先进的一元处于对东部的被动依赖状态而难以自拔，从而抑制了其经济能量向本地区后进一元的辐射、扩散。因此，西部的内陆省份应以企业开放为先导，优势产品为拳头，培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长点，开拓国际市场。目前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大多低于我国，我们可以研究对方的有效供给，向其大量出口轻纺工业产品和机电产品。要依托中缅、中巴两条国际公路（从发展看还可利用中越铁路），采取国贸、地贸、边贸与民贸共举的方针。国家财力许可时，还可考虑从西南部的滇缅地区建立跨界铁路，把产品打入南亚，并通过印度洋挤入西亚、东非等国际市场。新疆、内蒙等边疆省份则应以扩大对苏联中亚和蒙古的贸易为先导，展开多层次贸易，视进展推进产业联动，挤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六、政策投入——选择次优决策，改善投入方式

针对政策投入可能产生的扭曲、衰减、龙尾效应，政策设计要从西部的经济、文化水平

和社会发达程度远低于东部的实际出发，选择次优决策，即偏重于启动机制而不是一味追求方案最优。在所有制结构中，私营经济、真正的民间合作经济应占有更大比重，市场、价格应放得更活一些，行政干预应该更少一些，地方政府也应更“小”一些，即“更多的非国有经济，更活的市场，更少的行政干预，更小的政府”。少干预并非不干预，而是要干预到点子上，要避免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的倒错。对本地区有发展前途的中小企业，政府应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加以保护，使其能够进入正常竞争。改善政策的投入方式，可考虑政策的配套投入、持续投入（政策稳定少变）、突破投入（采取特殊政策攻其一点，激发内部活力）和强化投入（轻易勿令，令则必行，强化监督机制，确保政策兑现）。而且，既然经济技术的发展有所谓“梯度推移”，落后地区的政策推行也应考虑梯度投入。尤其要注重政策与当地的吻合度，选好政策投入的作用点。有了能够落实的政策，才谈得上政策的落实。

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概括基本国情时，讲了落后与先进的三个“同时存在”，这正是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因此从广义来说，二元结构的封闭不仅存在于西部之中，也存在于东西部之间，存在于整个中国，西部如能摸索出一套突破二元结构封闭的方法和经验，不仅能带来西部的新发展，还将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作出贡献。

1989年3月7日于中央党校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等：《中国西部：二元结构生成机理与趋同设计》，时事出版社，1989年1月版。
2. 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新疆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中国西部：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抉择》，同上，1988年12月版。
3. 郭凡生、王伟：《贫困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
4. [英]威廉·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期。
5. 郑洪庆、刘延安：《关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几点思考》（内部参考资料），1988年3月。
6. 李仁贵：《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理论与政策研究》，《经济研究》，1988年第9期。
7. 赵国权、周献刚：《从贵州看不发达地区国有企业的搞活问题》，《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
8. 童中心：《回顾与展望——新国际环境中东西部经济板块间的联系及前景》，《机关青年〈发展问题——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专号〉》，1988年3月。
9. 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10. 叶小文：《对省情的落后面作点“效应分析”》，《贵州日报》，1988年3月7日一版。
11. 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关于我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问题的论证报告》（内部参考资料），1989年1月。

作者工作单位：共青团贵州省委员会
责任编辑：张宛丽